

從《胡適口述自傳》論口述歷史

—— 張 秀 蓉 ——

壹、前言

貳、《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

參、《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過程及特色

肆、從《胡適口述自傳》論口述歷史的方法

伍、結論

壹、前言

二次大戰後，科技文明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飛躍前進，讓人們夢幻成真並享有前所未有的便利與舒適。然而，在面對戰爭的殘酷與科技文明所帶來的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始對以科學、理性為主的西方「先進」文明產生懷疑，進而重新檢討與反省。於是，新的學科、新的資料、新的研究方法，就在為探索人類文明之起源、發展與未來的需求下，逐一誕生、出現，令人目不暇給、目眩神迷，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便是一九五〇年代新興的方法之一。一方面，錄音、照相設備的進步和普及化，使聲音、影像的捕捉和保留成為可能的事情，亦即讓「過去」能夠栩栩重現。另一方面，隨著地球生活空間因科技發展而日益縮小，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們接觸頻繁，磨擦亦時有所聞。為解決此一問題，促進相互的瞭解與尊重，人類學家、社會學者……等

各領域的專家，試圖對以往被忽略的族群、團體重新加以重視，並致力於其文化的保留和研究。在面對這些文獻資料有限，甚至沒有文字傳承的族群，口述歷史就成為相當有效與可行的方式。口述歷史在人文學界、社會科學界備受注目，而史學工作者亦嚐試借用口述歷史來從事史學的研究。然而，在運用的過程中引發許多的爭議，無論是在運用範疇、方法論或其評價上，至今仍毀譽參半、莫衷一是。

究竟什麼是口述歷史呢？根據大美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的說法：「許多口說的回憶錄集結起來，當做史料來使用，便是口述歷史。」(註1)此一方法的採行，在中、西史學著作中，皆有範例。亦即中西方皆有口述歷史的史學傳統。史學大家司馬遷足跡遍佈中國(註2)，每到任何一地，都訪問長老，緬懷古往先烈。在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中處處可見此類記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徵詢耆宿遺老、有關人員的口述資料，進而展現出生龍活現的歷史與人物風貌。例如：出身豐沛的漢初要人之微賤時生活，即是採訪所得。樊鄴滕灌列傳贊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綰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留子孫哉？」。另外，清代章學誠亦曾藉助口述資料，纂修《臨清縣志》，

註1 "Oral History, the collection of spoken memoirs for use in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past."引自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Incorporated, Inc.,1981), Vol.21, p.7.

註2 五帝本紀曰：「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司馬遷二十歲時遍遊東南及中原地帶；當了郎中以後，二十四歲扈駕西行，二十五歲奉使川滇，將中國西陲和西南的人文山川，皆收納其懷。之後隨武帝封禪遊歷海上與塞外風光。足跡所未至者概朝鮮、河西、嶺南諸郡耳。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市，蒲公英書局，1983年)，頁67-96；頁316-317。

如「親詢鄉婦委曲」撰寫該縣的〈烈女列傳〉。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治史，便是遊歷埃及各地，親見親聞後，才完成著名的《波斯戰史》(Persian Wars)；另一位希臘史學家也是遍遊希臘各城邦，從事訪問，並仔細搜尋證據後，才寫成《伯羅奔尼撒戰史》(Peloponnesian War)。(註3)但是嚴格來說，這些並非今人所說的口述歷史，充其量只能算是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或稱口傳歷史。所謂口述傳統是用口述的方法，轉述過去所聽到的歷史。而口述歷史則是指透過訪問程序，以現代化的科技產物：錄音機、照相機、錄影機……等，使應訪者自述其親身參與及聞見的近年之往事，並轉記成為文字，作為歷史之見證。此即現代史學上的口述歷史。(註4)

現今口述歷史的發展，多歸功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芮文斯教授(Allen Nevins, 1890-1971)在四〇年代的倡導。一九三八年芮文斯教授敦促史學界的同行建立一個組織，以便有系統地與尚健在的重要美國人士作廣泛的接觸，以搜集近六十年來，他們參與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活動的資料。芮文斯教授所指的資料不僅是口述歷史，也包括書面資料，希望透過此一方式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儲備一份獨特的自傳檔案。此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 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在韋慕庭(C. Martin Wilber)教授主事下，配合幾個基金會的贊助(註5)，開始推行口述歷史的訪問計畫。此一風潮亦迅速推廣到歐、亞、非

註3 王聿均，〈談口述歷史〉，《史政學術講演專輯(二)》，頁3。

註4 朱宏源，〈論口述歷史訪問的方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二年度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論文，民國82年)，頁1-2。

註5 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經費，除一部份來自哥大本身，亦獲得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國家人文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魯絲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等機構所給予的資助。王聿均，〈談口述歷史〉，頁6。

洲。(註 6)臺灣在口述歷史的研究與運用，亦在許多機構中陸續地、廣泛地被採行，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臺灣省文獻會……等等。訪談對象涵蓋現代史上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特殊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藉此發覺、整理資料，展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發展與特色。各機構更出版了不少人物的訪問記錄及刊物(註 7)，促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了解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的運用及書籍刊物日益增多，學者們對於口述歷史的優劣、方法、評價亦產生許多的疑惑與爭議。學者認為：借助口述歷史，史料的收集方法有了重大的突破，可以提供活生生的歷史材料，以勘補現有歷史資料之局限和不足。然而，也有不少學者對口述歷史的方法及價值提出批判，質疑口述歷史與追求客觀、真實此原則的相互矛盾。例如：研究人員在訪談對象的擇定、訪談內容的設定，是否帶有研究人員

註 6 歐洲方面，英國於七〇年代成立「口述歷史學會」(the Oral History Society)，發行期刊；美、英、法等國學者組成「口述歷史協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發行口述歷史刊物(季刊)，且每年召開一次全球性的會議；1980 年又有《口述歷史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History)的出現，刊登出色的口述歷史。亞洲方面，新加坡南洋大學歷史系曾進行歷史調查，政府設立口述歷史，通過口述訪談，將新加坡歷史資料加以記錄、編整、保存和推廣；香港博物館曾於 1987 年進行「香港人及其生活的口述歷史計畫」；大陸口述史料極多，在中共政權支持下發表大量的回憶錄、文史資料，但大部份含有濃厚的意識型態，然其中亦不乏珍貴史料，唯選用時宜慎重。參見許雪姬，〈口述歷史之採集與運用〉，收入《機關志講義彙編》(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2 年)，頁 129。林孝勝，〈新加坡口述歷史館〉，收入《口述歷史 1》，(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頁 231-234。丁新豹，〈香港博物館口述歷史計畫簡介(1987 年至 89 年)〉，收入《口述歷史 1》，頁 235-240。

註 7 參閱傅應川主編，《第四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口述歷史書刊聯合目錄》(台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3 年 12 月)。

主觀的、刻意的安排？受訪者的可靠性，包括：個人有意的扭曲和偏頗，記憶中的遺忘和錯誤，都將直接影響口述歷史的正確性及其價值。(註 8) 因此，不少學者對口述歷史的定位及可行性持有相當的保留態度。為了對口述歷史的運用、定位與價值有較清晰的認識，且不流於空泛的談論，因此本文選擇唐德剛先生所著的《胡適口述自傳》一書，做為討論的例證。希望透過《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採行方法、內容特色……等方面的敘述和討論，以釐清口述歷史的地位，以及對《胡適口述自傳》的褒貶評價。

貳、《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

《胡適口述自傳》一書，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在一九五、六〇年代口述歷史計畫中的一個個案。哥倫比亞大學從事中華民國現代史人物的口述歷史工作，有其因緣和背景。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史，本來就不像歐洲漢學家一偏重於中國的語言學、考古學、藝術史和中西交通，而是更重視近代中國的政治、商業和貿易。其主要原因應與美國西岸濱臨太平洋，十九世紀即已經由太平洋與東亞往來、貿易，介入亞洲事務有關。為求有效打入與瓜分東方市場，美國自然要對東亞各國有所瞭解，因此對東亞研究自然是以近代(當代)的實際狀況為主。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日本間爆發太平洋戰爭，美國因此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深深捲入東方事務中。大戰結束後，美國躍居世界兩大霸權之一，成為民主國家陣營中的領袖，對抗蘇聯所領導的共產國家集團。在紛擾、亟待復員的戰後時局中，亞洲局勢卻在一九四九年又有劇烈變化——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奪得中國大陸政權。對美國而言，等於共產集團又增加了一個強大的力量，不容美國小覷。為瞭解並抑制中共的擴張，二次大

註 8 見 Anthony Seldon and Joanna Pappworth, By Word of Mouth: elite Or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 1983), p.16- p.35。

戰後，美國各著名大學紛紛興起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潮，哥倫比亞大學就是其中之一。而口述歷史是史學家和學術機構蒐集現代史資料的重要方法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從事民國史口述計畫，以中華民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作為主要訪問對象。而中國大陸淪陷之後，許多對現代中國曾經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包括：軍事、政治、財經、教育、學術各界人士紛紛移居在外，有的住在香港，有的住在美國，住在美國的人士又有一大部份是住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紐約。因此，哥倫比亞大學得以就近以這些人為訪問目標，開始口述歷史的實際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所訪問的人物計有：胡適、蔣廷黻、顧維鈞、孔祥熙、李宗仁、張發奎、張國燾、左舜生……等人。(註 9)一九七二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公布一部份中國名人的口述歷史，一時洛陽紙貴，轟動美國漢學界，成為研究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盛事。這份中國名人口述歷史中即包含唐德剛先生所撰寫的《胡適口述歷史》。

唐德剛一九二〇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唐家圩(今屬肥西縣袁店鄉)，從小喜好文史，十四歲時已點校一遍《資治通鑑》。抗戰初期，他隨合肥臨時中學遷往武漢。一九三九年唐德剛在湘西以優異成績，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一九四四年，應安徽學院史地系主任李則剛之聘，講授西洋通史。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繼續史學深造，攻讀歐洲史及美國史。五〇年代中期，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並先後應聘於哥倫比亞大學與紐約市立大學中執教，從助理研究員、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亦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七年。一九七二年，轉往紐約市立大學，擔任亞洲學系教授，並出任該系系主任前後凡十二年之久。(註 10)《胡適口述自傳》是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緣際會下與胡適先生合

註 9 王聿均，〈談口述歷史〉，頁 5-7。

註 10 徐承倫，〈關於胡適、李宗仁的口述歷史及其他——唐德剛教授訪問記〉，《文史哲》1993 年第六期，頁 77。

作下的產物。

胡適(1891-1962)先生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著名的學者之一。唐德剛認為：胡適先生是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界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正因為他既「開來」又「繼往」，在思想流於偏激的人們看來，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連折衷派也不如的「反動學者」。同時在思想傾於保守的人士眼光裏，胡適卻又變成了背聖絕賢，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因而胡適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自己常說的「左右為難」中渡過。(註 11)胡適青年暴得大名，但五〇年代初、中期卻是他一生中的最低潮。海峽兩岸，一邊是徹底批判—中國大陸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一邊是尊而不親—臺灣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只是個亞熱帶小島，煙水鄉里，無從捉摸的「香格里拉」。因此，胡適只得定居紐約。然而，紐約生活並不容易。當時排華法律及種族歧視猶在，且中國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在紐約處處可見。他們在美國的社會中既未受尊重，亦無伸展機會。胡適也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格斯德中文藏書部(Gest Library)做一個「管理者」(curator)每年領取數千美元貼補家用而已。這份閒差在整個大學的行政系統中是微不足道的。胡適也在美國著名學府作過短期講學、或零星演講，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有建樹性的工作。美國文教界對胡適先生維持表面尊敬，實際上對於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多採取敬而遠之，能免則免的態度。在此境況下，胡適也只得常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看中文報紙，以消磨時間、歲月。(註 12)

胡適是安徽人，哥倫比亞大學出身，北京大學成名。因此，他對這

註 11 唐德剛著，《胡適雜憶》(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8 年)，頁 2-3。

註 12 在夏志清為《胡適雜憶》所作的序中，曾提及胡適先生在紐約時生活。從胡適閱讀張愛玲小說(當時既無名望當代小說又非胡適研究對象)、美國兩岸所發行和贈閱，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僑報，以消磨歲月。可見胡適在紐約的空乏與苦悶。見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8-9。

三重背景都存有極深厚的溫情主義，如同以往中國知識份子著重籍貫的「畛域觀念」，以及傳統士人對個人出身和學術師承的「門戶之見」，這種心境、情感持續著，且老而彌篤。在困居紐約期間，胡適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無意聘任胡適擔任教席或學術研究的工作，胡適在無適切工作、研究環境下，只得常到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看書、閱報，而和在館中工作的小同鄉唐德剛認識。以後便經常打電話請唐德剛替他查書、借書。有時唐德剛還為胡適開車，並應邀到胡家吃胡太太江冬秀女士所燒的安徽菜。唐德剛基於對長者與前輩的敬重，與胡適往來頻繁。胡、唐之間的往還和不拘形式的教導，受同鄉、同校情誼的影響，在五〇年代美國的「鬱悶」環境中，日益增長深厚。結果，唐德剛成為胡適在最失意、最孤獨時期的學生。

唐德剛除了隨胡適去聽演講外，單獨地上「胡適學」的課程在一千小時上下，這是胡適眾多學生中所未有的。一九五六年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註 13)兼職時，正巧遇到自西雅圖(Seattle)來該部校訂張國燾訪問稿的羅勃·卜頓(Robert A. Burton)(註 14)，二人相談甚歡。卜頓見唐德剛一面修博士學位——研究美國內戰時期的外交史，一面為了生活糊口在中國歷史研究部做半時研究員兼翻譯，同時又在東亞研究所兼做半時助理研究員。前者研究主題是漢代的社會史，後者研究重心則在民國史，因而研究工作頗為雜亂。(註

註 13 中國歷史研究部，原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而設，主持人為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教授。我國知名社會史家馮家昇、王毓詮、瞿同祖諸先生皆曾任該部研究員有年。

註 14 羅勃·卜頓曾是一位美國駐華記者，1949 年脫離新聞界後，自福特基金會申請一筆研究費，留在香港訪問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之一的張國燾先生。工作經年，積稿數百頁，透過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介紹，來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從事校訂工作，因為這個研究部原是哥大、華大兩校聯合設立的。

註 15 唐德剛自述說：「……那時的研究工作，說來可笑；我上午搞漢書；下午參加北伐；夜晚鑽美國檔案。」見唐德剛著，《胡適雜憶》，頁 206。

15)卜頓建議唐德剛不妨仿效他的辦法，先找一位中國名人作訪問對象，然後再向福特基金申請一筆研究費，組織個小計畫，一方面有自足的經費和報酬，一方面亦可擺脫如此多頭而混亂的研究現況。唐德剛於是向胡適提及此一構想，並向他解釋芮文斯教授「口述歷史」進行的程序，得到胡適的熱心贊同和參與。之後，為尋求贊助機構，以便向基金會請款，而探訪東亞研究所的韋慕庭教授。韋慕庭教授此時正在組織一個大規模的計畫——「中國口述歷史計畫」(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於是便將唐德剛的計畫併入其中。一九五七年哥大這個「中國口述歷史計畫」在福特基金撥助之下，漸次成形了，唐德剛被指派去訪談胡適，正式展開工作。(註 16)

總之，《胡適口述自傳》之所以成書，正是哥倫比亞大學在芮文斯教授倡導口述歷史，以及美國對中國研究熱潮結合下的大環境，加上胡適蟄居紐約的寂寞失意，以及與唐德剛之間往來情誼的撮合下而產生的。

參、《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過程及特色

在訪談之前，胡適要求唐德剛擬定一個訪問計畫。唐德剛初擬的工作大綱，第一步是把胡適有關他自傳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歷年日記以及其他零星散文加以擇要整編。第二步是以「訪談」方式來填補這些著作的空白，做出個詳細的胡適年(日)譜。第三步是根據此系統中的高潮，擇要而做文章，一方面可以協助胡適口述其自傳，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據這個系統和資料，由唐德剛從旁補充和修正之。胡適先生認為此計畫大綱野心太大，當時胡適出掌中央研究院的呼聲甚高，胡適亦有意返臺，他或許自知旅美時日無多，所以囑咐唐德剛縮小

註 16 唐德剛著，《胡適雜憶》，頁 206-209。

規模。加上哥倫比亞大學希望能早點有具體成果，以便繼續獲得基金會等機構的贊助，因此亦傾向縮小規模，並刪除中文稿。胡適認為哥大既無意留中文稿，那麼此一自傳的作用只是向英語讀者介紹胡適，如此則不應採「填空白」方式，還是以有系統的綜合敘述為佳，政治史料、社會史料也就可有可無了。唐德剛依照胡適之意及當時環境修改原擬大綱，胡適再依此大綱逐條修正，完成自述大綱。

根據這個大綱，訪談工作於一九五七年的冬初開始。唐德剛攜了部笨重的錄音機到胡府訪問，但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消息已正式發表，胡府官場酬酢，人來人往，訪談備受干擾，不得不請胡適改至哥大工作—訪談，口述完畢後再由唐德剛陪同用餐及開車接送返家。二人訪談進行的方式則是：唐德剛將大綱中各章節研究一遍，擬出個有系統的小節目單，並把這些章節的相關資料和情節稍加彙編。訪談時，根據這個單子和資料，向胡適發問或請胡適自動敘述。敘述中的人名、地名、時間、地點、引文、中文資料的正確英譯、辭句的編排、校訂……等，則由唐德剛負責，並擬成一草稿以代替胡適本擬自己動手的功課。胡適依據此一草稿，作為第二度有系統錄音的藍本，即依此草稿作一番有系統的口述。二度口述後，唐德剛獨自回放(play back)，再以英語校訂(edit)一遍，便交與打字員，打出初稿。初稿在唐德剛手校一遍後，即交予胡適核定認可之，如此一章一章地作下去，而完成《胡適口述自傳》的訪談部份。(註 17)此一訪談資料，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於一九七二年公佈，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營的美洲縮微膠片公司影印發行。數年後，傳記文學社取得該稿翻譯權，於是委任唐德剛擔任漢譯工作，按章發表。唐德剛根據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計畫」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和筆者所保存，並經過胡適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胡適口述的英文稿，按當初計畫，全稿分為三篇二

註 17 同上，頁 210-216。

十九節，但後篇或下卷始終未作出，故唐德剛按原有目次重分為十二章，以便單獨印行，自成一書。(註 18)

《胡適口述自傳》共分十二章，依序如下：

第一章故鄉與家庭。介紹故鄉徽州的地理環境。由於耕田少而貧瘠，導致鄉人向外經商營生的現象。徽州人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一般徽州商人多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而逐漸發財致富。由於家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徽州人多靠在城市裏經商的家人，按時接濟。胡家世代鄉居，故宅在績谿城北約五十華里，歷代都是靠外出小本經營為生，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的小鎮——川沙，經營茶葉店，並在上海成立支店。胼手胝足，歷經戰亂、劫掠，這兩家茶葉店仍能繼續經營，並成為我們一家四房的衣食來源。

第二章我的父親。胡適父親胡傳(一八四一～一八九五)一生轉折遭遇的描述。父親排行居長，自幼即協助先祖打理茶葉店中商務。十六歲時因資質聰穎，家中長輩特地延聘塾師，教授詩文，以便參加科舉。太平天國之亂，皖南糜爛不堪，父親協助族人重建家園。太平戰後，父親進學為秀才，省試不中，入上海龍門書院就讀。就學期間，對中國地理——尤其是邊疆地理產生研究興趣，並決心終身致力於此。一八八一年受吳大澂知遇之恩，為其幕僚，先後奉派考察東北、海南島，以及襄贊治河(黃河)、督導堤工。在吳大澂的保舉下，以直隸州候補知州分發各省候缺任用。一八九〇年以後，先後擔任淞滬厘卡總巡，臺灣知州及統領，政聲卓著。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父親雖患嚴重腳氣病，仍在劉永福將軍堅持下留臺服務。不久病重離臺，隨即病故於廈門。

註 18 唐德剛譯著，《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0 年)，頁 1-2。

第三章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學生生活。因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而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保送不少中國留學生至美留學，胡適亦是其中一員。本章敘述在康乃爾大學所接觸的教會團體、接待家庭、及美國政治(總統大選)的狀況。胡適原本是學農科的，在三個學期之後，轉入該校文理學院，改習文科。主要原因是個人志趣一對哲學、文學、政治史的興趣，因而胡適在康乃爾文學院先後完成三個學科程序－哲學和心理學、英國文學、政治和經濟學。這些不同領域的訓練，深刻影響日後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生命。

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訓練。包括：公開演講的訓練，民主程序(議會程序)的了解，以及胡適對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平主義(pacif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等思想的接觸和信仰。胡適認為：公開演講常迫使他對一個講題作有系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思，然後再作有系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對其大有裨益。而透過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的主持，讓人能有效掌握民主會議程序，也使胡適對民主政治、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的活動情形有所瞭解。在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經驗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之交往，令胡適對不同人種、不同文明體驗良多，使胡適對和平的取得和維持，從偏激的不抵抗主義，從而相信用集體力量來維持世界和平，然後由一個國際組織來防制戰爭的可能性。

第五章哥倫比亞大學和杜威。描寫胡適由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在哥大所接受的哲學訓練和薰陶。其中為人所熟知的杜威博士(John Dewey)及其實驗主義和實證思維術對胡適一生的文化生命而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胡適認為：實驗主義大師中，杜威博士是對宗教看法較為理性化的。而胡適對杜威博士多談科學少談宗教的更接近「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比較有

興趣。因此，胡適轉學哥大，從學其門下，並且日後在中國多方推廣此一學術思想。

第六章 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胡適認為他的治學方法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胡適從小即有好懷疑的傾向，促使他在漢學、宋學、校勘訓詁之學中，學習對證據的探討。而後，康大布爾教授(G.Lincoln Burr)的「歷史的輔助科學」，讓胡適對語言學、考古學、高級批判學(higher criticism)等，略有所知；另外哥大烏德瑞教授(Frederick J. Woodbridge)的「歷史哲學」，教導學生高級批判學和西方古籍批判史，也指導學生如何清查偽托和認清竄改。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杜威教授有系統的推理思考的理論對胡適有極大的影響。

第七章 文學革命的結胎期。敘述胡適對語言和文學裏各種問題是如何產生興趣，以及如何主張以活的通俗語去代替半死的「文言」，即以白話文作為教育工具和文學媒介的經過。語言文字乃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因為它必須深入到百萬千萬的廣大群眾中，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但在一些事件的刺激，終促使胡適主張使用老百姓的語言、街坊的語言作為教育工具，並且用它來做文學媒介的改革。一九一七年發表於《新青年》的〈文學改良芻議〉，揭櫫白話文學的論點，對古文學派展開猛烈批判。

第八章 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胡適以中國文字為整個語文(改革)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的基礎之問題，亦即說明語言文字改革是更大的文化運動中的一環。所謂新文化運動，胡適比較喜歡用「中國的文藝復興」此一名辭，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則是此運動的真義。具體言之，研究當時具體和實際的問題、輸入新的觀念和理論、批判(整理)傳統的學術思想、進而產生新的文化或文明，即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四重意義。

第九章 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胡適認為：五四運動是整個文

化運動中歷史性的政治干擾，並且將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自此所有政黨都想爭取青年知識份子的支持，以學生群眾形成一種政治力量。結果弄得知識界人人對政治發生興趣，大大削弱文化運動的推展。

第十章從整理國故到研究和尚。胡適重述〈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對近三百年國故學上的成就與缺陷有所說明，並且提出如何加以補救——大學教授們定下心來，對國故、中國文化史作有系統的整理。在整理國故運動中，胡適則在中國思想史的著述，以及禪宗真正開山宗師——神會和尚的研究上用功頗多，並有所創見。

第十一章從舊小說到新紅學。中國傳統小說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搜尋舊小說的不同版本，經由校勘工作，尋找最佳版本，並加以印行，這是整理中國傳統小說進而向廣大讀者介紹的實際行動。胡適另一用心頗多的小說為《紅樓夢》，胡適用現代歷史考證法來處理這部小說。胡適認為：它是一部自傳，而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不同，是出於高鶚的善意作偽。

第十二章現代學術與個人收穫。在胡適生涯中所從事批判性的整理國故工作，至少有兩大目標：一是中國文學史，另一個是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本章是胡適自述四十年學術研究的心得與看法，做為本書概括的總結。

從上面十二章的篇目來看，可以發現胡適的自傳與一般名人的自傳在性質上、頗有差別。「自傳」一詞，《辭海》定義為「自述生平之著作」，在中國過去被稱為「自敘」、「敘傳」、「自紀」、「自述」等。在英文裏面「自傳」(autobiography)一詞從語源來看，指的是「自己」(auto-)對於「個人生平」(bios)的「敘述」(graphia)，也就是敘述自己生平的著作。(註 19)此外，類似的尚有回憶錄 (memoir)，但二者本就有所不同。

註 19 George Misch, E.W.Dicks(translated),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5。

(註 20)不過在中國的分別並不太大，通常用「自傳」這個名稱的較少，而用回憶錄的似乎較為普遍。一般名人傳記多半以敘事和說故事為主，而《胡適口述自傳》則重在論學，尤其是討論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古典著作，是一部學術性的自傳(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註 21)

肆、從《胡適口述自傳》論口述歷史的方法

在進行口述歷史計畫時，學者除了執行方法的思考外，更不免會觸及較深層的歷史本質的問題。例如：口述歷史在本質上、定位上究竟屬於何種層次的資料？亦即在過去的歷史重建或詮釋上所扮演的角色何？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如何？此外，與現代史家所熟悉的檔案文獻相比較下，其差異性及優劣性又如何？(註 22)這些都是在探討口述歷史時不得不思考的課題。

口述歷史的功能與定位，會直接影響到口述歷史的方法論，若未能釐清或有所界定，在沒有標準或指引下，學者將不知如何來看待此一歷史研究方法，更談不上了解，以及如何地進行和運用。因此，在說明或批判口述歷史或這一類作品前，必須先弄清楚口述歷史的定位。依據前言部分的描述，口述歷史是史料的一種，用以彌補文獻、實物之不足。既是史料而非史著，對其要求自然不同於史學著作。史料的要求是儘可

註 20 回憶錄所記載的通常是作者認為重要的人和事，亦即專門回憶人物和事件的記錄。回憶錄和自傳之不同處，在於前者較重視作者所身處的社會和歷史背景，而較不重視作者個人的私生活，有時作者甚至很少提到自己。張瑞德，〈自傳與歷史〉，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台北市，龍文出版社，民國 78 年)，頁 7。

註 21 唐德剛著，《胡適雜憶》，頁 1-2。

註 22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IX。

能的完備、詳盡和真實，以便史家依據這些資料來作合理的推演與重建。親身參與或耳聞者的陳述，不僅可以印證、勘誤文獻資料的誤漏，並且讓歷史的深度或動態的一面，更具體地被呈現出來。甚至這些相關的陳述，也將成為日後新領域的開拓或研究所需要的重要佐證。

口述歷史由於訪談計畫在設定上的不同，以及訪談者、受訪者主客觀條件的差異，造成口述歷史在完備、詳盡、真實的目標上令人質疑。也就是說，口述歷史的執行並無固定化或標準化的流程，而常常是依主、客觀環境的需要來做調整或變動。因此，有些口述歷史的學者視口述歷史的採集方式是種藝術，而非完全的科學方式，而在調整的過程中，常令人產生對口述歷史的不信任，認為它是研究人員隨其需要，自由取捨、擺佈的遊戲或結果。進而質疑或否定它的存在與價值。然而在不斷的討論和運用下，學者雖未達成一致共識，但仍對口述歷史的作法或目標，深入探討與反省。在眾多的討論中，將口述歷史視為史料的一種，亦即獲取歷史材料的方法之一，而非一種新的史學。因此，不管學者在計畫的設定或訪談技術上的調整為何，其最終目標都應是史料搜集的完備，任何方法上的變通都不應與此相違背。

口述歷史依研究規模及日後用途的不同，可粗分為三大類：一是私人的研究，研究者從研究生到有經驗的作家，他們以個人身份接觸受訪者，以獲取為特定文章、專書的撰寫所需要的資訊。由於是針對研究者個人專擅之範圍或題目來設定，故採訪對象或採訪內容皆由研究者依其需要與認知來進行，所需經費、時間較易掌控，研究者自我發揮的空間較大。但在人力、財力限制下，其成果與運用上可能有極大的限制。二是口述計畫，特定的機關團體為某一特殊研究目標而進行較大規模的口述歷史採集。比起私人研究在採集規模及層面上，自然較多而複雜，亦需要較多內部協調，以及與組織團體間較緊密的結合。研究主題或層面擴大，有益於此課題的多面探索，但個人的作法需因應組織、團體的要求而有所修定。三是口述檔案的方式，與前二者有較明確目標的收集相較下，此類口述歷史的受益者並非訪談者或特定人員，而是日後的研究者與新領域的發展。因此，只要認定訪談資料將有所作用或保存價值時，

即加以採集，以期留下更多完整的資料。充份滿足資料完備之要求，但衍生而來的龐大經費、人力、和保存資料的空間、設備……等問題，卻是棘手之至，必須仰賴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私人或基金會只怕力有未逮。(註 23)這三者在進行的注意事項或資料取舍上或有所不同，但大致上所經過的步驟卻不出下列四部分：計畫、規畫(Project)；訪談(interview)；轉記、記錄(sifting)；歸類存檔(storing)。

口述歷史的進行，首先面臨的就是規畫問題，也可稱為定向(orientation)問題。若無規畫，訪談對象的選擇，訪談的內容及所涉及的層次或深度……等皆無從考量。而口述歷史進行所需要的時間、經費等問題，亦無法估算。這些問題若無法解決，口述歷史將難以進行。但學者對口述歷史的規畫又常遭人質疑，甚至詬病。有些人認為：學者可以透過人選、訪談內容的詳加規畫，只選取自己所需的部份，其餘則摒棄之，「創造」學者自以為是的歷史，令人對口述歷史的存真程度，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然而，若缺乏此一規畫步驟，整個訪談就會像一艘既無目的，又缺羅盤指向的船隻，航行於大海之中，茫然失措。對此一左右為難的狀況，目前並無定論。研究者在分寸的拿捏上，似乎只能依賴個人學術訓練、或研究主題及相關資料的掌控，自行判定、調整。因此，難免有各行其是的情況，也就產生五花八門的各種法則和理論。面對變通處理下的口述資料，使用者自然遲疑不前。結果是——後代學者只能希望口述歷史的計畫者和執行者，皆能將規畫源起及過程加以記載留存，以備後人的理解和判讀。這不僅是個負責任的作法，也是令後人在對口述歷史的發展及資料運用的限度、優劣，提供最實際的幫助。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寫在書前的譯後感〉及《胡適雜憶》(註 24)

註 23 同上，p.11-p.12。

註 24 《胡適雜憶》原題〈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曾在《傳記文學》上連載十期(第一八三期至一九三期)，原本是作為《胡適口述自傳》一書的短序，後因篇幅過長(十餘萬字)，只得另行出版成為專書。書中對於胡適一生牽惹的問題與糾葛、生活點滴與掌故，有著活潑而生動的描繪。

一書中，提供了不少《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背景及其過程，讓後人得以更清晰地研讀此一作品，進而評估它的作用和價值。此外，這些雜記中的補述、追憶，讓後人有機會一窺胡適生活中自然且不修飾的一面。

在唐德剛的敘述中，不難發現：胡適口述計畫原是一個私人研究，故胡、唐二人對計畫大綱有他們獨特的看法和作法。後來，在因緣際會下併入哥大東亞研究所的「中國口述歷史計畫」中，成為大規模計畫中的一部份，因此在研究定向上必須考量東亞研究所的立場和規畫。同時為遷就胡適的時間(留美時日有限)，及當事人(胡適)的意見，整個計畫的大綱和進行方式不得不加以調整，以利計畫的順暢進行。而胡適當時更考慮到：未來讀者既是美國大學中治漢學的研究生，因此章目結構、材料取舍、乃至文稿的語文選擇，皆是以「美國研究生」為考量，許多精彩的個人看法或言論皆被捨去不錄(或不用)。對於此種取舍，我們所看到的是胡適較嚴肅而有條理的學術敘述，對於胡適個人的心境與其他發展，則著墨有限。在層層考量下，此一口述計畫定位於——胡適學術方面的有系統敘述。此一定向規畫不僅是後人的遺憾，也減損了這本口述自傳在史料完備上的價值。

訪談是口述歷史最具特色的部分。如何取得受訪者的合作，獲取最豐富的資料，有賴訪談前的準備、訪談時的技巧、訪問者與受訪者間的互動，這些都將決定訪談的成功與否。在進行訪談前，訪問者必須對相關史料、背景的掌握和理解，下點功夫，以免疏漏重要關節或為受訪者所輕視，影響了訪談結果。訪談前與受訪者關係的建立也十分重要，若彼此能有某種程度的信賴，將有助於受訪者勇於表達、陳述過往。訪談進行中除了必備的器材須準備妥善外，訪問者應以誠懇的態度，引導受訪者開始陳述。除了特定問題或疑問的請教外，儘量讓受訪者暢所欲言，以便從中發掘更多的資料和證據。為了讓訪談順利進行，訪談的時間、訪問長度、地點等皆需斟酌，以免訪談被干擾，影響口述歷史的進度或品質。

唐德剛在進行訪談時，就曾因胡府的人潮、電話干擾，而不得不改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以爭取口述採訪的順利進行。此外，胡、唐二人的同鄉、同校、及以往的相處，種種情誼所建立的友善、信賴程度，也使胡適對於眾多事務、問題能夠也願意說與唐德剛聽。可惜二人口述方式的進行——依所訂大綱搜集資料、擬稿、再依草稿增減口述的流程(見本文三、《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過程及特色一節)，漏失了許多胡適最真實、也頗珍貴的史料和感受。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亦寫道：「……治口述歷史的學習過程中，在胡適先生認可的正式錄音記錄裏，實在所學有限。使我獲益最多和了解胡適最深入的部分，還是胡公認為的『off the record』(記錄之外)的那一部份，……胡氏也坦率說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細枝末節，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異……。這些都是正式『記錄』上所沒有的……。」(註 25)

這些是口述訪談中最可貴的部分，可惜在胡、唐二人的口述計畫中被遺漏。此外，為了有系統的介紹胡適觀念的這部「學術性自傳」，顧得了學術的介紹，就顧不了當代政治、社會背景的陳述。也就是說，在認識胡適的部份之餘，其他相關史料的採集、保存，自然十分有限，與口述歷史的目標、功能頗有出入。這些都是唐德剛在規畫與訪談中因遷就主、客觀環境，而未盡周到之處。

口述歷史中整理記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亦是爭議頗多的部份。首先，是否所有口述訪問都需要轉化為完整的書面稿？如何轉記？前者的答案是不一定，因為在人力、經費的限制，加上轉記的技術與分寸拿捏並非易事，為免誤導讀者或研究人員，只要有良好的分類、建檔和保存，書面稿並非一定的工作。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為使資料流通，研究者方便使用，仍有不少訪談記錄被轉記為文字而印行出版。既視口述歷史為「史料」的一種，在轉記過程自然必須忠於受訪者的原意，

註 25 唐德剛著，《胡適雜憶》，頁 220-221。

不任意修改、詮釋或扭曲的原則。有些受訪者的說法或細節與訪問者資料有出入者，在小心向受訪者查問後，仍應忠實記下受訪者所說的。至於真偽的判定，就留給研究或使用此一口述歷史資料的學者去查證和判定。若訪談者貿然以自己的修正或意見混入其中，一來有損此一口述歷史的原始性，二來或許喪失了勘補現有資料的價值和功能。

《胡適口述自傳》一書，從成書過程及內容來看，許多地方都與口述歷史的要求出入頗大。例如：唐德剛自承：「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註 26)加入的這些材料雖事後經胡適認可，但這種作法是不是口述歷史所應有的，則是一個頗爭議的問題。因為口述歷史之所以珍貴，就在講述者自己透露那些不為人知的部份。(註 27)其次，文字涵養和掌握程度也是一個重要爭議，亦即如何正確、精確傳達受訪者原始敘述的意思和感覺。唐德剛對於哥大的英文稿本就不甚滿意，認為那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爾影印發行，未免草率。當年胡、唐底稿是英漢並用，後因哥大要求刪除中文稿，為此，一些論學專有名詞和學術討論的漢譯英，亦頗費一番手腳取捨。二十年後，唐德剛再依英文稿及手邊殘餘資料由英譯漢，其中的誤差，只怕在所難免。何況，唐德剛亦指出：記人言之困難，不得其意時，往往以己意出之的現象。從英文稿到中文稿，其中文字雖說是胡適的口述記錄，但頗多部份是唐德剛聽聞後，再表達、記錄下來的東西，其中也有誤記或誤解之處吧。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胡適與唐德剛在行文、用字、遣詞上的極大不同。胡適在美國所受的學術訓練與推動白話文的背景，其為文較為淺白、平實。而唐德剛為文則多是半文半白、文白相雜；而且唐德剛文字的深刻，筆調的潑辣、愉悅、豪放、尖銳，令文章讀來引人入勝、毫無冷場，是其文學上

註 26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卷 45 期 4，民國 73 年 10 月，頁 11。

註 27 朱浚源，〈論口述歷史訪問的方法〉，頁 7。

的功力與優點。但對於口述歷史希望忠實表留口述者史料的目標，只怕有所妨礙。不同的表達文字和筆調，是否將令人誤解胡適的意見和感受呢？以上所提各項都是對唐德剛所譯著《胡適口述自傳》是否應被視為口述歷史，在方法、作法上的一些質疑。

最後，口述歷史在訪談後，除了轉記記錄之外，訪談資料、錄音帶、錄影帶的編整和保存，亦是不容輕忽的課題。為了長久保存，錄音帶、錄影帶本身的品質自當留意，收藏地點的溫度、濕度亦需留心，否則只怕這些最原始的口述史料壽命不長。在耗費眾多人力、資源後，這些珍貴資料未及使用或研讀，即已毀損，豈不令人扼腕？此外，為了使用的方便和普遍，口述歷史的編目、提要、分類索引等資料之製作，將是不可或缺的。透過這些引導資料，研究人員將可調借相關錄音帶、錄影帶，親自聆聽這些口述者的陳述，再應用到他們研究的領域或專題之中，進而發揮口述歷史的功效與價值。

伍、結論

人類的歷史資料，最早祇能靠遺物。語言發明後，增加口傳的資料，歷史就變得比較動態。俟文字出現，許多動態資料被長久記錄下來，口傳資料自此與文字結合。日後文字資料一枝獨秀，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要依據。到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之後，口傳資料的登錄進入另一個時代。言者、聽者與記錄者之間的距離，在了解的程度上有了重大突破，說話的原音被保存，記錄者藉著重覆播放，可以較完整無誤地將原意登錄下來。以前因主觀判斷與認知上的差異，所生誤傳、誤導、誤解的遺憾，至此減到最低。說話者的情緒，甚至特殊的語氣，都能藉著文字或科技產物而被保留下來，更增加動態的層次。(註 28)

註 28 〈發刊詞〉，《口述歷史 1》，頁 3。

口述歷史的主要目的，在於搜集並保存史料，亦即視口述歷史為史料的一種。尋找歷史的見證人，提供不同角度的回憶，祇要是真實的回憶，且具有史料價值，皆應列為訪談的對象。事功顯赫之士，自然值得記錄；一般人民如對某一重要歷史事件或發展有所證見，亦值得留下記錄。中國近現代史是一段錯綜複雜、變化神速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遷是令人目不暇給的。在這樣一個時代裏，各行各業的中國人，特別是居於領導地位或置身關鍵角色的際遇，就顯得格外重要，必須詳加記錄。(註 29)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中是一個受人注目且有爭議的學者，他在中國文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影響力，是不容輕忽的。唐德剛在美國與胡適先生的往來和情誼，致使二人有機會進行口述自傳的計畫，而後有《胡適口述自傳》的發行刊布。

從《胡適口述自傳》的成書經過和內容來看，與口述歷史或自傳都不太相同，而比較接近「傳記」，一本由胡適先生口述提供資料，唐德剛考訂、過濾、組合的傳記。《胡適口述自傳》在方法論上與口述歷史的差異，從規畫、訪談到轉記記錄等方面的差異，已在前文中描述，現在再將傳記、自傳的區分稍加說明。所謂「自傳」和「傳記」是兩門不同的學問。自傳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傳記是史學，是有訓練的歷史學者的工作。寫自傳的人，其內容的真實性，和所保存史料的價值，則是根據作者自己對社會的貢獻而定；憑著自己的記憶力、組織才能、見識和私德來寫作，信不信由你。寫傳記的人則是根據他的職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職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執筆。偏信無徵，則是訓練不足；曲筆厚顏，則是道德有虧。一位執筆人如果自信訓練有素，道德無虧，則為人作傳，雖不中亦不遠矣。唐德剛在替胡適所擬的胡適口述歷史計畫大綱，是想「自傳」「傳記」兩方面兼顧的。(註 30)

註 29 同上，頁 4。

註 30 唐德剛著，《胡適雜憶》，頁 210-211。

然而，從內容的考訂、陳述的方式，似乎處處可見的是唐德剛對胡適認識與了解的反映，亦即透過唐德剛去了解胡適的成份比較大。所以，我認為這本書是唐德剛著作的一本胡適先生的學術性傳記。

傳記是一種史學著作，而自傳、口述歷史則被視為史料，二者的標準自然不同。史料要求真實、詳盡，但是自傳、口述歷史常被人批評因強烈主觀色彩而影響到做為史料的真實性。不過，既然視口述歷史為史料的一種，研究人員在採用之前，本就應該先行檢驗，以確定這份口述歷史資料的正確無誤及可運用的限度，而不是貿然地完全採信。也就是說，口述歷史並非一種新類型的歷史，只是另一種歷史方法，幫助研究人員搜集到另一類型的資料或證據，以便更深入而客觀地了解歷史。雖然口述歷史是一種絕對主觀且片面的史料，然而史家或研究人員將他們與其他史料放在一起，試圖從其中建立一個客觀的歷史實體或事實。也就是說從眾多的主觀中尋找、建立客觀。

(本文曾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由教育部主辦、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承辦的「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中發表，並已收入《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論文集》上冊，今經修訂後重刊。)